



以“以诗为词”与“自是一家”论苏轼密州词

A Study of Su Shi's Mizhou Lyrics by “Poetry as Lyrics” and
“Styling Oneself”

林劭恩

LIM SHAO EN

21ALB02128

指导教师：余曆雄师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FEBRUARY 2025



以“以诗为词”与“自是一家”论苏轼密州词

A Study of Su Shi's Mizhou Lyrics by "Poetry as Lyrics" and
"Styling Oneself"

林劭恩

LIM SHAO EN

21ALB02128

指导教师：余曆雄师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FEBRUARY 2025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4 Lim Shao E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当前研究情况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5
第四节 研究难题	6
第二章 苏轼与词的关系	6
第一节 以诗为词	7
第二节 自是一家	9
第三章 苏轼密州词	11
第一节 忧国爱民	12
第二节 思乡怀人	15
第三节 人生感慨	17
第四节 唱和酬答	20
第四章 革新词体之原因	23
第一节 生活环境	23
第二节 思想品性	24
第三节 无柳七郎风味	26

第五章 结语	27
--------------	----

引用书目	29
------------	----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姓名：林劭恩 LIM SHAO EN

学号：21ALB02128

日期：2025 年 4 月 20 日

摘要

苏轼自熙宁四年起外任，先后在杭州与密州任职，开启了其词创作的重要阶段。在杭州三年间，苏轼正式涉足词坛，创作多为纪游、酬唱、赠妓之作，题材较为狭窄，受限于“酒食地狱”的社交环境。熙宁七年调任密州后，其词风发生重大转折，北方旷野的环境激发其豪放之气，创作出《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豪放词作，标志着“以诗为词”“自是一家”的词学理念逐步成型。本文以苏轼密州词为研究对象，第二章将阐释“以诗为词”、“自是一家”词学理论。第三章将其密州词分为忧国爱民、思乡怀人、唱和酬答、人生感慨四类，并结合其生平与思想，深入探讨苏轼对词体内容与风格的革新，彰显其在词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最后第四章将分析词风革新的三大动因：生活环境的变迁、苏轼独特的思想品格，以及其有意摆脱艳词风格的追求。

【关键词】 苏轼、密州词、以诗为词、别是一家、豪放

致谢

非常感谢大学时期帮助过我的老师们、朋友们、家人们，愿各位平安顺遂。

第一章 绪论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苏轼身处于社会经济、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史学等各方面，都令人瞩目的北宋时期。苏轼也为后世留下了 2700 左右首诗，300 多首词，大约 4800 篇散文作品。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中将苏轼的创作发展分成七个阶段，即初入仕途时期，和两次“在朝——外任——贬居”。¹

熙宁时期（1068-1077），王安石鼓吹变法，甚得神宗之意，变法就此开始。苏轼曾向宋神宗说明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²，也曾多次上书列出“新法”的弊端。当时，宋神宗大力支持变法，因此苏轼的反对是徒劳无功的。由此可知，苏轼与宋神宗、王安石等人持有不同的政见。苏轼一系列的上书批评“新法”的举动引发了王安石的不满，因而诬陷苏轼。在这种形势下，苏轼为了避开是非、希望在地方民政上有所作为，便主动请求离开朝廷。熙宁四年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他在杭州足足待了三年时间。直至熙宁七年九月，他便离开杭州，移任前往密州。

纵观苏轼一生，政治上得意时少，坎坷时多。他经历了乌台诗案，但仍胸怀大志，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苏轼从繁华华丽的杭州，去到穷乡僻壤的密州，这无疑是很大的反差。在密州他还要面对蝗旱、盗贼、弃婴等问题，但他仍勇敢直面解决问题，为密州百姓创造了一个平安稳定的环境。在文学上，论苏轼的词作数量而言，密州词仅有十九首，不及杭州词的一半。但是，苏轼在密州开始有意

¹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 422。

² [宋]苏轼著 [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 25. 页 729。

识地革新词体，以“以诗为词”的态度，创作出“别是一家”的苏轼词。这让传统词突破了“小道”、“艳科”的束缚，使词不只是在刻画男欢女爱，扩大了传统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地位。因此，本文选择苏轼的密州词作为研究对象。

第一节 研究动机

苏轼第一次自请外任离开京城，去到了杭州和密州当官。熙宁四年十一月至熙宁七年九月（1071-1074），苏轼在杭州做了三年通判。苏东坡在前往杭州前，几乎没什么进行词的创作。根据《苏轼词编年校注》，苏轼倅杭前的编年词仅只有4首；而杭州期间（1071-1074）苏轼共创作了35首编年词。总的来说，苏轼于杭州才正式开始词的创作。据《萍州可谈》记载：“杭州繁华…东坡倅杭，不胜杯酌，诸公钦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倅为酒食地狱。”³在杭州期间，苏轼大多数的词便是在这种“酒食地狱”环境中创作出来的。这时期的词以纪行、记游、酬唱、赠答、赠妓为主，如有《浪淘沙·探春》《南乡子·送诉古》《菩萨蛮·歌妓》等。由此可见，苏轼杭州词作的题材内容略为狭窄。

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从杭州前往密州。与杭州相比，当时的密州是个贫瘠之地，两州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差别。由南方的小山小水转至北方的广阔平野，为他创作“豪放词”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苏轼从杭州前往密州的途中，创作了《沁园春·孤馆灯青》，他将内心的浩瀚之气用词的方式外化了，是他词风转折的重要作品。在密州任职期间，苏轼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此词全是直抒胸臆的豪言壮语，具有代表苏轼新词风的典范意义。苏轼写完之后，自己

³ [宋] 朱彧，《萍洲可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卷3，页324。

兴奋地评价此词：“无柳七郎风味”、“自是一家”。⁴而与苏轼同时代的门生陈师道评道：“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⁵可知，苏轼开始了“自是一家”、“以诗为词”之词的创作。

密州词可视为苏轼“豪放词”的创立期，并且其“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⁶，为词各方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本文以苏轼的密州词作为研究文本。为了对苏轼的密州词作有更清晰的了解，本文第二章，选择先对“以诗为词”、“自是一家”两概念进行解释，以为接下来的论述打下基础。接着的第三章，笔者将苏轼密州词作进行了分类，分成了四大类——忧国爱民、思乡怀人、唱和酬答、人生感慨，并通过“自是一家”、“以诗为词”的理念，以及苏轼的生平背景、思想，去探究苏轼对词的内容风格的创新。最后第四章，再去探析造成苏轼革新词体的原因，笔者认为原因有三：生活环境、思乡品格、无柳七郎风味。这样一来，便能对苏轼密州词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第二节 当前研究情况

苏词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都以苏轼在黄州、惠州的词作作为主要研究范围，而对于苏轼密州词的研究占比较少。有关苏轼密州词的论文，有王洪、周季平〈苏轼的密州词与豪放词风的创立〉，通过分析苏轼密州词的题材、结构、语言，认为苏轼在密州的 19 首词中，有 14 首词以豪放为主要倾向。陈冬梅〈试析苏轼

⁴ [宋]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卷 53，页 1560。

⁵ [宋] 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台北：长安出版社，1978），前集，卷 39，页 336。

⁶ [宋] 王灼撰、唐圭璋编，〈碧鸡漫志〉，《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 1 册，页 85。

密州词的思想内涵>中，选取了苏轼在密州创作的九首词，来分析苏轼的政治理想与超然思想。王雪峰的硕士论文<苏轼密州作品研究>将苏轼在密州的作品按内容分成“豪情密州”、“政治才干”、“胸怀大略”、“至情至性”四大类，并对这四类的作品进行解析，展示了苏轼密州作品的整体风格。此外，对于集中讨论苏轼密州词的专书数量较少，而讨论苏轼密州作品最全面的有——李增坡《苏轼在密州》记载了苏轼在密州所创作的诗、词、文等，并收录了研究苏轼密州作品的论文等。因此，苏轼在密州的词作仍有探讨的空间。

王水照《苏轼研究》自序中评价：“苏轼是一位复杂而难以评论的作家，在他身上存在着不少研究难点，同时也往往成为争论的热点和焦点。”⁷因此，许多学者选择苏轼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苏轼身上还存在许多可讨论的空间。许多出版社有出版关于苏轼作品的合集。文学类的有《苏轼文集》《苏轼全集》；年谱类的有《苏轼年谱》《三苏年谱》；评传类的有《苏轼评传》《苏轼研究》《苏轼传稿》。注评类的有《苏轼全集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东坡乐府笺》等。关于收集、讨论苏轼作品的书籍琳琅满目，本文将从中选取最合适的资料，以方便进行论述。

关于苏轼“以诗为词”、“自是一家”在学术上有较多的讨论。专书方面，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高建中《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中，提及词为“古人长短句诗”是以诗为词的思想基础；“自是一家”的词风是以诗为词的要旨。本文将以此理论作为基本框架，进而阐述苏轼的“以诗为词”与“自是一家”。徐安琪《唐五代北宋词学思想史论》的第四章第一节对苏轼的“以诗为词”、“古人长

⁷ 王水照，《苏轼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页12。

短句诗”、“诗之余”与“自是一家”进行了解释，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刘扬忠在《唐宋词流派史》中，提出了自身对“诗余”与“自是一家”清晰合理的看法与解释，能让读者更加容易明白这两概念。论文方面，诸葛忆兵<“以诗为词”辨>对“以诗为词”的含义、演进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与探讨。

第三节 研究方法

全文使用了文献研究法。通过查阅、分析、综合相关书籍的知识，以便对苏轼的“以诗为词”、“自是一家”以及其密州作品有更全面的认识。另外，笔者也阅读了大量期刊论文与硕士论文，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背景，也对创建本文的各章节与小节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大量深入的阅读与分析，能够了解到此课题的研究情况。通过把握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找到立足点与创新点。

另外，本文第四章使用了分类研究法。苏轼在密州的词作数量不多，共有十九首。本文将以邹同庆、王宗堂的《苏轼词编年校注》来统计苏轼在密州创作了几首词。并且，根据作品内容将苏轼密州词划分成了四大类——忧国爱民、思乡怀人、唱和酬答、人生感慨。经过分类后的苏轼密州词作，将呈现更加清晰明了的作品思想、艺术特色等，为本文观点提供了思路与想法。

除此之外，本文也采用了文本分析法。若要研究苏轼密州词，最基本的步骤便是要对苏轼所创作的密州词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读与分析，掌握相关词作的思想情感、文学特色等。通过对文本本身的文字、题材、风格形式等进行分析，能够发掘出文本中的表层与深层意涵。通过结合文本本身与作者的生平背景进行分析，能够挖掘出许多作者藏在文本下的深层意义。在研究过程中遇到问题，最简单有

效的方法便是通过分析文本获得解答。

最后，此文也运用了历史批评法。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在过去历史的具体社会下应运而生。因此，本文不只是单纯地研究苏轼的密州词、“以诗为词”、“别是一家”，也会将苏轼词置于当时词人身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密州环境下去进行分析，从而可以了解到作者受到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等的影响。其影响也会清楚地体现在苏轼所作的密州词作中呈现出来。

第四节 研究难题

对苏轼密州词与“以诗为词”、“别是一家”进行分析的专书较少。此外，深入全面地探讨苏轼密州词的论文数量也同样较少，抑或是有些资料不允许被下载。在这种资料有限的情况下，笔者在撰写论文之际难免会遇到难题与影响。

在参考书籍有限的情况下，笔者只能通过筛选合适的书籍、专章、论文等，并在本文中运用最为合适的学者观点，希望能透过此方式来弥补本文的短板。另外，不同学者、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他们收录苏轼密州词的数量并不一样。这导致笔者在统计苏轼密州词的时候，会出现混淆的状况。因此，笔者通过翻阅不同学者注的苏轼词、作品，以找出最适合的一本，来进行苏轼密州词的统计。

第二章 苏轼与词的关系

词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亦被称为“曲子”、“曲子词”、“长短句”、“乐府”。词是诗和乐在隋唐时期进行融合而形成的产物。⁸词自《花间集》至柳永，始终不

⁸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475。

能摆脱“词为艳科”的发展趋向，其创作大多以女性闺阁、男女情爱此类型的主题展开创作。宋代初期，词还被视为不登诗歌殿堂的“小道”、“小技”。

词至苏轼才正式开创了豪放一体。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评：“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⁹他肯定了苏轼对词的创新，而“新天下耳目”也道出了苏词的影响，指不少词人紧随苏轼的步伐创作词，逐渐形成词史上的豪放派。苏轼对词有着很大的贡献，其“以诗为词”是一种自觉的革新意识，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提及：词为“古人长短句诗”是以诗为词的思想基础；“自是一家”的词风则是以诗为词的要旨。¹⁰因此，本章将厘清“以诗为词”与“自是一家”的概念，为接下来的论述打下基础。

第一节 以诗为词

苏轼“以诗为词”是基于诗词同源的词学观念，这点他在黄州时期有以明确的理论表示。¹¹因此，若要理解苏轼“以诗为词”的概念，就必须先理清苏轼“诗词同源”的词学观念。苏轼《与蔡景繁十四首》写到：“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¹²，据此看出，苏轼认为词本质上就是诗，是“长短句诗”。对苏轼而言，诗词本一脉，二者具有相通性。苏轼认为诗词同源，但是他并没有将诗词混而为一，而是认为诗词同源，而异流也，便开始了“诗余”说的说法。

⁹ [宋]王灼撰、唐圭璋编，〈碧鸡漫志〉，卷2，页85。

¹⁰ 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高建中，《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37。

¹¹ 徐安琪，《唐五代北宋词学思想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页217。

¹² [宋]苏轼，〈与蔡景繁十四首〉，卷53，页1662。

¹³苏轼在《题张子野诗集后》中说：“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¹⁴，此话虽有重诗轻词之意味，但仍将词视为诗之“余技”。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通常称词为“诗余”，此说法便来源于苏轼。吴熊和《唐宋史通论》中提到，当时人们将词称为“诗余”，并非贬义，它是苏轼推崇词体、革新词风后所形成的新观念。¹⁵

“诗余”与“诗之裔”同义，皆指诗词同源，词是附属于诗，为诗的一股支流。苏轼又在《祭张子野文》中曰：“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¹⁶苏轼将诗称为“清诗”，将词称为“微词”，略有诗大词小之意，但是将词定义为“诗之裔”，与前人将词视为游戏、小道的观点相比，无疑是提高了词的定位。¹⁷

在宋代“以诗为词”本是一种贬语。最先提出苏轼“以诗为词”的是宋人陈师道。他评苏轼：“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¹⁸北宋末李清照《词论》曰：“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¹⁹彭乘云：“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著棋、吃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²⁰从上述所列的言论，可看出与苏轼同时代的词人，

¹³ 徐安琪，《唐五代北宋词学思想史论》，页 221。

¹⁴ [宋] 苏轼，〈题张子野诗集后〉，卷 68，页 2146。

¹⁵ 吴熊和，《唐宋史通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页 290。

¹⁶ [宋] 苏轼，〈祭张子野文〉，卷 63，页 1943。

¹⁷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页 237。

¹⁸ [宋] 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前集，卷 39，页 336。

¹⁹ [宋] 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 266。

²⁰ [宋] 彭乘，《墨客挥犀》（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 4，页 324。

大多数对苏轼的“以诗为词”抱有批评的态度，认为苏轼词“非本色”、“句读不葺之诗尔”等。直至南宋以后，家国的沦陷逼迫词走出风花雪月的象牙塔，词人的目光渐渐投向更开阔的现实社会，因此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理念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²¹

虽然苏轼“以诗为词”，但是他并没有要破坏或不顾词的要求和规范。苏轼对词进行革新，主要是用作诗的精神去创作词，用诗之雅去改造词之俗。这能提高词的品格、丰富词的意境、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表达技巧等。

第二节 自是一家

苏轼于密州创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是第一首“豪放词”的代表。词中直接展示了壮观的出猎场景、立志报效国家的理想，让词走向更广阔的词境，打破了“词为艳科”的束缚。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分享了自身最近作词的情况，他兴奋地写到：

所惠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之者绝少也。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²²

从中我们可看出，苏轼自豪地提出自己的词“亦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这证明了苏轼是有意识地进行创新，以提高词的意境和风格。²³首先，苏轼先称赞了鲜于子骏的作品不合“世俗之耳目”但却有“远古风味”。刘扬忠认为其中的

²¹ 诸葛忆兵，〈“以诗为词”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页78。

²² [宋]苏轼，〈与鲜于子骏书〉，卷53，页1560。

²³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页449。

“世俗”，指的是江西词派衰落之后的新一代词人模仿柳永词的现象²⁴，即是“柳七郎风味”的词。这里表现出对柳词的否定，也暗示苏轼自身作词并不刻意迎合世俗之耳目。

词最早产生于民间小曲，是诗和乐结合形成的产物。一开始唐代的民间曲子词，虽然题材内容受到了限制，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较为广泛的，其情感也是很丰富多彩的。例如，收录在《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敦煌古往出神将》，刻画了将军与人民的爱国激情；《送征衣·今世共你如鱼水》虽表达了妻子对远在边疆的丈夫的思念，但其情感是乐观健康的基调。后来文人也受到曲子词的影响，词作内容多元化，如戴叔伦《调笑令·边草》，刻画了边塞的艰苦生活；张志和《渔夫》五首描写了渔夫生活和其高尚品格。

至到晚唐五代，词受到西宫体的影响，才逐渐形成寻花问柳、愁肠寸断、男女情爱的主题。²⁵“花间鼻祖”的温庭筠，多创男欢女爱、脂粉华靡的温庭筠，从而让词走上歧途。而柳永发展花间派的艳丽词风，将词从“绝代少女”转变为“偎香偎暖”的成熟少妇。词至苏轼，他“以诗为词”、“别是一家”，才真正恢复了唐代民间曲子词的原始面貌和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如刘熙载《艺概》记载：“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²⁶正因如此，就有了苏轼“别是一家”的词作。

柳永是婉约词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描绘了歌妓生活、城市风光和羁旅

²⁴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页 238。

²⁵ 朱靖华，〈论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苏轼论》（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页 219。

²⁶ [清]刘熙载，《艺概》（台北：汉京文化出版社，1985），卷 4，页 108。

行役之情。苏轼写到自己的词“无柳七郎风味”，认为自己的词是另一种风格，并能间接看出苏轼对柳词不满意，认为柳词缺乏“气格”，但是他并不反对进行婉约词的创作（此第三章将会进行论述）。苏轼有力于将充满绮罗香泽之词注入阳刚豪放之气，以区别于柳词当中那些柔媚艳俗之作。这便是苏轼所谓“自是一家”的词，是有意识地洗去“柳七郎风味”词的绮罗香泽之态和浅斟低唱之风，让词能像诗一般成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工具，提高词的意境、题材、地位。

第三章 苏轼密州词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记载了苏轼于何年何月何地创作词，并且此书目录以年份递增作为排序，便于笔者进行统计。因此，本文主要根据《苏轼编年校注》统计苏轼在密州创作了多少首词。另外，也以苏轼著、龙榆生校笺的《东坡乐府笺》、李增坡的《苏轼在密州》作为辅助资料。据统计，加上苏轼前往密州路上创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以外，苏轼在密州创作了 17 首词。此时期的词作数量，比杭州词作数量少了一半，但为词的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刘熙载《艺概》中，评价苏轼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²⁷由此可见，苏轼扩大了先前“小道”词的题材。本文将苏轼赴密途中所作的《沁园春·孤馆灯青》以及在密州创作的 17 首词，根据其内容题材进行了分类，笔者将其分成四大类：忧国爱民、思乡怀人、唱和酬答、人生感慨。接着，结合苏轼的“以诗为词”、“自是一家”与其思想，在每类选几篇词作

²⁷ [宋] 刘熙载，《艺概》，卷 4，页 108。

进行分析。

第一节 忧国爱民

苏轼是一位性格正直、刚烈的士大夫文人，并将“爱国忧民”当成己任。因此，“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自然成为了组成苏词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苏轼的《沁园春·孤馆灯青》《江城子·密州出猎》《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三首词都展现了他爱国、爱民的伟大精神。通过苏轼在密州所作的忧国爱民之词作，来窥探苏轼的“以诗为词”、“别是一家”，和其思想。

杨海明《唐宋词史》中提出，苏轼真正形成自己面目的词作，是从杭州赴密州途中所写的《沁园春》开始。金人元好问评价此词：“极害义理，不知谁所作，世人误为东坡。‘当时共客长安’之句，其鄙俚浅近，叫呼眩鬻，殆市狙之雄，醉饱而后发之”²⁸，认为此《沁园春》一词，并不是苏轼所作，认为此词粗俗言浅。莫砺峰在《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中认为元好问持有怀疑是合理的，因为此词中所抒写的人生志向和牢骚之情，在苏诗中比比皆是，但在苏词中则显得相当生疏。²⁹从中能看出，苏词的题材风格，从此时开始发生了变化，因为苏轼是有意识地创作“自是一家”的词，目的是为了摆脱“柳七郎风味”。

苏轼《沁园春》是他词风转变的起点，他让词开始转向抒写词人内心的壮志情怀。例如，此词抒发了苏轼“致君尧舜”的爱国之情，并用陆机、陆云来比喻自己和弟弟苏澈，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苏轼还化用了杜甫诗《奉赠韦左丞丈

²⁸ [金]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卷 36，页 487。

²⁹ 莫砺峰，〈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中国文化研究》2002 年第 2 期，页 10。

二十二韵》中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来表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也化用了杜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现实中，宋神宗大力推广王安石变法，不重用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因此便有了苏轼“袖手何妨闲处看”的洒脱情怀。“袖手何妨闲处看”也展现了苏轼的超然情怀，不要被框在不被朝廷重用的悲伤情绪，而是要继续积极面对人生。

此外，苏轼以使用典故、化用诗句的方式，在词中表现了豪迈与婉约并存的风格。展现政治抱负、洒脱情怀，在诗中是很常见的题材，但在传统词中则是极为少见的。由此可见，苏轼《沁园春》作为苏轼革新词体的起点，此词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将词突破了艳丽柔情的束缚，开始转向描写个人壮志，开始用诗的精神去创作词，体现了苏轼“以诗为词”、“自是一家”的创作理念。

熙宁八年（1075）十月，苏轼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猎》，此词全是直抒胸臆的豪言壮语，具有代表苏轼新词风的典范意义。苏轼写完之后，自己兴奋地评价：“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³⁰传统的《江城子》本是表现柔美艳情的婉约词牌，但苏轼却用其表现慷慨激昂的报国理想，这是一种崭新的创新，也正是苏轼所言的“无柳七郎风味”。此词上篇刻画了气势壮烈的出猎场面；下片则用“射天狼”来表述自己欲请征西夏为国效力。《江城子·密州出猎》让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从传统词的温柔女性转变为充满豪气“聊发少年狂”的壮士。苏轼为了实践自己的艺术理想而“自成一家”，进行大胆的创作，此词可称得上是词史上一次全新的创新。

³⁰ [宋]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卷 53，页 1560。

苏轼一面革新词体，一面又保护词的特点，并未将诗词混为一谈，消灭诗与词原有的艺术价值。吴熊和认为，在苏轼词中，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并不相互排斥³¹，笔者也认同此说法。《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第一首较为成熟和完整的豪放词，它是词，但却融入了豪迈磅礴的诗意与诗韵，令人耳目一新。虽然此词有豪放的基调，如展现了“左牵黄，右擎苍”、“射天狼”的豪放“野性”，但也不失婉约的特点。

《江城子》一词，如何展现其婉约的特点呢？苏轼的雄壮“诗情”与他的豪放“词情”息息相关。他在豪放词中展现“诗情”时，常常意犹未尽，便会再另外写一首同一题材的诗。³²笔者将以苏轼所作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与诗《祭常山回小猎》做比较与分析，这两部作品创作于同一时期，并且表现了同样的主题。《祭常山回小猎》诗中用“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³³，直截了当地表明希望到西北边防为国效力。而《江城子》词中只用“射天狼”³⁴来委婉比喻希望能为国效力，与诗中的表达比较，词用“射天狼”表达已显得较为含蓄了。由此可见，苏轼在创作豪放词时，仍保有词原来婉约的特点，形成了豪迈与婉约并存的词风。另外，一诗一词，题材相同，说明苏轼“以诗为词”，已经摆脱了“诗大词小”、“诗庄词媚”的传统偏见，大胆走向宋词的革新之路。³⁵

³¹ 吴熊和，《唐宋通论》，页211。

³² 朱靖华，〈评苏轼“以诗为词”的时代意义〉，《苏轼论》（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页235。

³³ [宋]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卷13，页647。

³⁴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146。

³⁵ 朱德才著、李增波编，〈东坡词走向成熟的标志——略谈密州三曲〉，《苏轼在密州》（济南：齐鲁书社，1995），页569。

第二节 思乡怀人

苏轼此时期除了用词来言志外，还运用词来抒情。据笔者统计，苏轼密州词共有5首词作带有思念故土、怀念亲人好友的思想感情。思念故土的作品有《蝶恋花·密州上元》《望江南·春未老》《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怀念亲友的词作则有《江城子·乙丑正月二十日记梦》《画堂春·寄子由》。

熙宁九年（1076），苏轼重登超然台，触景生情，思念故乡。于是，便创作了《望江南·春未老》。词上片描写了一片细雨迷蒙的景色。苏轼创作此词时，正值清明节，清明节不由自主地让他想着了自己的亲人。因此，词下片则借景抒情，表达词人的思乡情怀。

面对思乡的苦闷心情，苏轼认为应“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³⁶，把握现有的时光，好好享受生活。苏轼也做到了“诗酒趁年华”的超然态度。例如，他来到环境恶劣的密州，并没有因环境恶劣，而成日郁郁寡欢。反而为当地老百姓解决了蝗灾、盗贼等问题，给他们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通过苏轼词及其生平，能窥探出他面对挫折时的乐观与旷达，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另外，苏轼《望江南》是首豪迈与婉约相兼的词作，通过描写春景和词人的情感变化，来表达苏轼豁达超脱的超然襟怀，豪放但又不失规矩地开拓了词的意境。

苏轼怀念亲友最具有代表性的词作，便是悼念已逝世妻子的《江城子·乙丑正月二十日记梦》。治平二年（1065）王弗病逝，至熙宁八年（1075）刚好十年，

³⁶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164。

这是苏轼首次在词中刻画“妻子”形象。这首词虽属婉约词，但却被苏轼改造成了一首“悼亡词”。悼亡是诗歌的传统题材，在苏轼之前，文学史上只用诗来悼念亡妻，如潘岳的《悼亡诗》等，而苏轼是第一人使用词来悼念亡妻。³⁷苏轼将词与诗看做同等地位的文学题材，用“以诗为词”的精神进行词的创作，帮助开拓了词的词境。

苏轼悼念词《江城子》通篇描写了他对亡妻王弗真挚而深厚的思念之情。开篇写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³⁸，看出王弗已逝世十年之久，但苏轼对她的思念之情仍如泉水涌出。苏轼的相思之情，用“十年”一词刻画，可见他的思念之情很深厚。十年的岁月默默从身边流逝，但他心中的思念却更浓。苏轼想要“不思量”，却又不能控制自己，而“自难忘”，因为思念之情早已融进了心灵，可见苏轼对亡妻的真挚情感。这种“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情感比起传统词的男欢女爱，更为深厚、真挚。

首句的“十年”，苏轼用时间来渲染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接下来，“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³⁹，苏轼通过用空间距离的遥远，刻画出凄凉孤苦的无可奈何。此句不只将相思之苦道出，更含有了词人寂寞心酸的“凄凉”眼泪。苏轼用“无处话凄凉”，含蓄地在词中表达自身的人生苦楚和坎坷际遇。他委婉写出苏轼十年间的仕途坎坷，不被朝廷重用的“凄凉”，最后还导致了他“尘满面，鬓如霜”的可怜。例如，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朝中遭受排挤冷眼；他请求外任后，皇帝的果断与决绝所显示的残忍；诉说他通判杭州后又转移密州的坎坷与艰辛的种种

³⁷ 朱靖华，〈旷世英才在密州〉，页 413。

³⁸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41。

³⁹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41。

“凄凉”。

苏轼悼亡词《江城子》不只表达了自身真挚的悼念之情，也融入了自身际遇，从而提高了词的意境。宋人王灼《碧鸡漫志》中批评了当时的传统词：“长短句虽至本朝而盛，然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⁴⁰，他指出“自立”与“真情衰”是传统词的致命弱点。而苏轼对传统词进行创新，从他的词作中总能看到他的真情实感，如这首《江城子》，冲破了传统词“穷风月、弄花草”、“浅斟低唱”的肤浅和陈腐模式，述说着自己的真情实感。另外，苏轼《江城子》的语言文字简单易懂，不使用生僻字，没有传统婉约词的晦涩难懂，如“十年生死”、“泪千行”、“鬓如霜”等等。上面所述，皆是苏轼词“以诗为词”、“自是一家”的各种体现。

第三节 人生感慨

苏轼创作词常使用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创作手法，使词能够像传统诗歌般表现对于人生的感慨与哲理情思。密州时期的《超然台记》苏轼提出“凡物皆有可观”，即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因而，便有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雨中花慢·今岁花时深院》《一丛花》《殢人娇·别驾来时》《望江南·春已老》《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临江仙·九十日春都过了》。

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39评苏轼：“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⁴¹另外，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伧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⁴²二人都给予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⁴⁰ [宋]王灼撰、唐圭璋编，〈碧鸡漫志〉，卷2，页85。

⁴¹ [宋]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后集，卷39，页321。

⁴² 王国维撰、唐圭璋编，〈人间词话〉，页4233。

一词极高的评价，可见苏轼《水调歌头》的历史地位。苏轼提出“凡物皆有可观”的理念，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便以“天”与“月”作为审美对象，他借问天、问月来抒发思念兄弟之情，也寄寓了自身的人生抱负，以写诗的精神去创作词。

词上片抒写了苏轼政治上的失意之情，以及矛盾的心情。结合苏轼身处的时代，上片讲到“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⁴³，“天上宫阙”可理解为朝廷，因为古代诗人、词人常用“天”来比喻皇帝或朝廷。“不知是何年”意指神宗采用王安石变法不知得到了如何的成效。“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⁴⁴，指出苏轼还想回到朝廷，但又害怕因政见不同，而遭受排挤的矛盾心情，那不如“何似在人间”，留在人间，离开朝廷。词下片表露了苏轼面对自身的苦闷之情，他如何去进行自我安慰与自我排遣，展现了苏轼的超然思想。词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⁴⁵，以人有离合，月有圆缺，道出世间万事万物皆不可能称心如意，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自我安慰，并提醒世人与自己“不应有恨”的积极乐观之意味。结尾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指希望所有人的亲人能平安健康，共享明月。词由抒发个人情怀，升华到心系天下人，展现了苏轼的济世情怀。

郑孟彤《唐宋诗词赏析》认为苏轼《明月几时有》：“流露出抑郁苦闷的悲哀情绪，使词的格调显得低沉，缺乏激励人心的力量”。⁴⁶笔者并不认同此说法。笔

⁴³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73。

⁴⁴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73。

⁴⁵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73。

⁴⁶ 郑孟彤，《唐宋诗词赏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页 292。

者认为从词所抒发的情感来看，苏轼《明月几时有》展现了作者面对挫折时，乐观积极的态度，也表现了其“无所往而不乐”的超然哲学思想。正如夏承焘认为：此词情绪是健康的，词里虽有出世与入世、情与理的矛盾，但最后还是以理遣情，不脱离现实，没有悲观负面的消极思想。⁴⁷此外，苏轼《水调歌头》词中大量化用了前人诗句、典故，其中有李白《把酒问月》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戴叔伦的《二灵寺守岁》的“已悟化成非乐界，不知今夕是何夕”等。⁴⁸据统计，苏轼有 331 首词作，其中 189 首有用典。⁴⁹苏轼词中的豪放与婉约风格并存，突破了传统词的柔情艳丽，以“以诗为词”的态度创作词，使词深婉中不失豪迈，形成了“别是一家”的宋词。

密州时期，苏轼大量以自己生活的细思琐事入词，如《雨中花慢·今岁花时深院》。《雨中花慢》一词看似在写景或咏物，实则在抒发自身情怀。密州遭遇了严重的旱灾蝗灾，苏轼日夜心忧，也时常到常山祈雨。此时正值春夏，虽然牡丹盛开，但却无暇欣赏，侧面表现出苏轼心系苍生、热爱生活的可贵精神。一直到九月，密州终于下雨了，但牡丹早已凋零。在百花尽残之时，唯独一朵牡丹逆时开放，因此苏轼“高会聊追短景”，置酒赏牡丹。

邓子勉认为这一朵逆时绽放的牡丹，表现出了苏轼不愿同流合污的志向。⁵⁰笔者认为这说法有道理，上文说过苏轼厌恶官场的虚名微利，不愿同流合污。此外，神宗采用王安石变法，但苏轼持有不同的政见，认为王安石变法不得民心，

⁴⁷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页 70-71。

⁴⁸ 陈冬梅，〈苏轼“自是一家”的密州词创作简论〉，页 52。

⁴⁹ 木斋，〈苏轼“以诗为词”涵义综论〉，《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页 82。

⁵⁰ 邓子勉，《新译苏轼词选》（台北：三民，2008），页 320。

所以被王安石等人污蔑。苏轼并没有因此而赞同王安石变法，而是自请外任知密州，展现了苏轼不愿同流合污的志向。

苏轼《雨中花慢》中：“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暇馀妍”⁵¹，指秋风不会怜惜牡丹的，渗透了词人对时光易逝的感叹。苏轼并不是一直沉溺在时光易逝、韶华逝去的悲哀情绪中，而是马上设宴赏花，将牡丹美好一面保留下来。这也表现了苏轼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因此，苏轼《雨中花慢》显然和苏轼在杭州年轻时富有火气的作品大为不同了。⁵²苏轼《雨中花慢》展现了他顺时知命的超然心态、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对生活中乐事的享受，以及他心系人民国家的理想与热情。苏轼用词表现哲理情思、个人情怀，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范畴，让词变得更有深度。

第四节 唱和酬答

苏轼在密州期间，创作了许多与友人的唱和酬答之词作。诗人之间以赠送自己创作的诗词以示情意，这便称为“唱和酬答”。笔者认为，苏轼的唱和酬答词有《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减字木兰花·送赵令》《蝶恋花·帘外东风交雨霰》《满江红·天岂无情》《江城子·相从不觉又初寒》五首。

苏轼到密州以后，一直至元祐七年（1092）共写了24首送别词，送别词在苏词中占了很大的占比。⁵³苏轼创作《减字木兰花·送赵令》一词，是因为他与赵晦之的再一次见面，使他感触良多，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词送给赵晦之。此词表达

⁵¹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143。

⁵² 王雪峰，《苏轼密州作品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09），页12。

⁵³ 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页51。

了苏轼对“岁月如梭。白首相看拟奈何”，时光易逝的无可奈何，但他不只是在感叹时光飞逝之快。苏轼也表达了自身经历官场的几度挫折后，不能像青松耐守岁寒一般，而感到惭愧。苏轼《减字木兰花》不只是单纯表达了对友人的不舍之情，亦感叹了时光飞逝之快，也表现了苏轼怀才不遇，但仍坚守职责，以及布局磨难等的积极品格，让词有了更广阔的意境。

上述小节中，笔者皆以苏轼词的内容进行论述，在这最后一节里，笔者也将以苏词的结构与形式进行分析，以助更全面地苏轼的“以诗为词”理念。结构方面，从苏轼的密州词能看出，苏轼作词大量采用了题目和小序，为词进行了创新。在苏轼之前的词人，写词时在词牌下加小序的，可谓是寥寥无几。到了苏轼，他吸取前辈创作的优点，大量地在词之下写标题和小序，是他对词的结构形式进行革新的其中一项。⁵⁴苏轼将“词序”入词，也是苏轼“以诗为词”对传统词进行改造的重要标志之一。苏轼在词中尽情抒发了各式各样的诗意，他只是将词牌当成一种形式使用而已，所以必须另加“词序”来补充说明。⁵⁵此外，朱靖华认为，苏轼为词题序，是继承了“诗序”的风格。

苏轼为词加上标题与小序，能使读者了解到作品的创作背景以及动机。例如，苏轼《减字花木兰·贤哉令尹》的词序是：“送东武令赵昶失官归海州”，清楚表明了词作的动机、送别对象、去往何地。另外，苏轼也为《满江红·天岂无情》写了小序：“正月十三日雪中送文安国还朝”，交代了创作日期、缘故以及送别对象。这些题目与小序，使词的主题明确，成为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⁵⁴ 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页 216。

⁵⁵ 朱靖华，〈论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页 226。

形式方面，苏轼虽然“以诗为词”，但是他并没有要破坏词音律方面的要求。苏轼曾在《书吴道子画后》提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⁵⁶，这是苏轼在文艺创新上的原则，其中的“法度”包括音韵声律等一系列的特殊规定。苏轼《答陈季常书》批评陈季常新词“豪放太过”。关于“豪放”一词，宋代评词人用来形容作词时任性挥洒、不顾音乐法度的作风。⁵⁷苏轼是明确反对“豪放太过”的，因此他的词并没有“不能歌不能舞”的现象。《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小序中，苏轼提及此词是应“善琵琶者”之情，取韩愈诗“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之作，由此可知苏轼一向主张词需合声律。⁵⁸而关于音乐和词意的关系，苏轼认为：应以词意为主，音乐为辅。词意决不能成为音乐的附属品，音乐是为了充分表达词意而服务的工具。

⁵⁶ [宋] 苏轼，〈书吴道子画后〉，卷 70，页 2210。

⁵⁷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页 244。

⁵⁸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页 245。

第四章 革新词体之原因

木斋《唐宋词流变》提及：“真正实现豪放词风创制的，是苏轼随后的知密州时期”。⁵⁹木斋认为苏轼创立豪放词风的原因有三点：一、经历了杭州时期词的创作，为其打下了基础。二、地理环境的改变。三、苏轼的性格、人格、文格。本文将以三方面论述苏轼革新词风的原因：一、生活环境的骤然改变，二、苏轼的思想品性。三、让词“无柳七郎风味”。

第一节 生活环境

苏轼到密州之初，密州面临严重的蝗旱，人们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如苏轼《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提及：“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瘞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馀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⁶⁰当地昏庸的官吏不但不救灾，反而“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⁶¹，苏轼对此极为愤怒。他一面上书要求朝廷减免密州百姓的赋税，一面亲自带领民众投入灭蝗斗争。苏轼也多次前往常山祈雨，他还“斋戒数月”，只为祈雨灵验。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蝗旱问题得到了初步的控制。

此外，密州的治安情况极为糟糕，不只弃婴遍地，还盗贼满城。苏轼《超然台记》记载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⁶²，他们到处抢劫掠杀，民不聊生。苏轼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给朝廷，建议朝廷减轻赋税、加强赈济、

⁵⁹ 木斋，《唐宋词流变》（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页131。

⁶⁰ [宋]苏轼，〈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卷48，页1395。

⁶¹ [宋]苏轼，〈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卷48，页1395。

⁶² [宋]苏轼，〈超然台记〉，卷11，页351。

整顿贪官、发展经济，以解决盗贼问题。经苏轼的精心治理，“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⁶³，盗贼逐渐减少。关于弃婴问题，《与朱鄂州书》记载了苏轼如何处理弃婴问题：“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⁶⁴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
尘随马。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
昏昏雪意云垂野。⁶⁵

苏轼在密州的第一个元宵节，创作了《蝶恋花·密州上元》，刻画了杭州元宵节的繁华热闹，密州元宵节的寂寞冷清，从中看出两地方物质生活的悬殊。苏轼从“酒食地狱”的杭州去到条件艰苦的密州，生活上得到了巨大的反差，这难免会影响他的心情以及创作风格。另外，苏轼的《超然台记》记载：“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⁶⁶，展现了杭州与密州地理环境的差异。苏轼从小山小水的杭州，去到广阔平野的密州，他在密州的所作所为、生活环境，无疑为苏轼的“野性”与“超然”思想提供了奔驰的空间。

第二节 思想品性

《游庐山次韵章传道》是苏轼在密州时所做，其中提及：“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⁶⁷，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提出“野性”的思想概念。他认为处在

⁶³ [宋]苏轼，〈与灵隐知和尚一首〉，卷60，页1891。

⁶⁴ [宋]苏轼，〈与朱鄂州书〉，卷49，页1416。

⁶⁵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134。

⁶⁶ [宋]苏轼，〈超然台记〉，卷11，页351。

⁶⁷ [宋]苏轼著 [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游庐山次韵章传道〉，《苏轼诗集》（北京：中

尘世间，犹如驾车的马驹遭受束缚，而放纵的鱼可任意游泳，才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当时密州的生活环境、质朴的密州百姓，让苏轼崇尚自由的本性得以流动，是苏轼“野性”思想的催化剂。⁶⁸“豪放”对词风的改革是“一洗绮罗香泽”，使词呈现出豪迈、雄放的风格；“野性”对词的革新，却比“豪放”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⁶⁹“豪放”是“野性”的体现，让词拥有“豪放”的风貌，如苏轼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⁷⁰等。而“野性”赋予苏词更深的内涵，体现了不同的情感和对生命的自我思考，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⁷¹等。因此，仅用“豪放”一词形容苏轼“以诗为词”的贡献，并不能概括其全部内容。“豪放”只是苏轼“以诗为词”的其中一种体现。

朱靖华认为苏轼在密州的另一重大思想发展，是苏轼的“超然”的思想。苏轼的“超然”思想是经过长期的社会磨练和深入思考而形成的。苏轼任密州太守一年后，密州的灾情减弱、盗贼减少。此时，他作了《超然台记》来表达自身对“超然”的理解，全文表现出洒脱、旷达的胸怀。苏轼为人刚直，不喜官场的虚名浮利，而屡屡被贬，一生仕途坎坷。《超然台记》中提及：“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可不大哀乎！”⁷²，他认为人应摆脱物欲、游于物外，才能发现生命中的“乐”；若一直沉浸在欲望与痛苦中，便永远找不到“超然”的乐趣。因此，苏轼的“超然”是对现实醒

华书局，1982），页 619。

⁶⁸ 朱靖华，〈旷世英才在密州〉，《苏轼论》（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页 395。

⁶⁹ 蒋珍珍，《论苏轼词的野性》（长沙：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论文，2017），页 12。

⁷⁰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46。

⁷¹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页 173。

⁷² [宋]苏轼，〈超然台记〉，卷 11，页 351。

龌一面的“超然”，他知道人总要回归现实，故不想飞天升月，并对生活保持着诗意的感受。⁷³苏轼在密州所作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便是个例子。

第三节 无柳七郎风味

苏轼创作出《江城子·密州出猎》后，自己评价此词：“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⁷⁴其中“无柳七郎风味”也道出了苏轼的创作动机。不少学者将苏轼归为“豪放”一派，而将柳永纳入“婉约”一派，认为两者水火不容。例如，龙榆生先生说到：“东坡在当世词坛，对柳永最为敌视，出言诋毁，非止一次。……柳词在当时实有无上权威，东坡欲别开疆宇，自不能不对此劲敌，思摧陷而廓清之”，⁷⁵认为苏轼将柳永视为劲敌，且反对柳永的婉约词风。笔者认为此说法并不妥当。

苏轼所说的：“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只是简单说明了他所作的词与柳词风格不同而已，并没有流露出鄙视柳词之意味。⁷⁶因此，龙榆生先生将苏轼与柳永处于劲敌关系，二者风格水火不容的说法有欠妥当。苏轼并不反对婉约词的创作，只是不满婉约词充斥文坛，不愿词被婉约词所束缚，不愿让虚情假意、男欢女爱湮没了词作。⁷⁷《侯鯖录》记载：苏轼读到柳永的《八声甘州》时，发出了赞美：“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⁷⁸，能看出苏轼对柳词并不是一概否定，还是有表示赞美的。此外，在苏轼密州词作中，能看出词中兼具豪放与婉约风格，

⁷³ 朱靖华，〈旷世英才在密州〉，页 399。

⁷⁴ [宋]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卷 53，页 1560。

⁷⁵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页 257。

⁷⁶ 邓昭祺，〈苏轼对柳永词之态度新论〉，《中州学刊》2007 年第 4 期，页 196

⁷⁷ 朱靖华，〈论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页 223。

⁷⁸ [宋] 赵令畤撰，《侯鯖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 183。

如苏轼的《望江南》，可知苏轼并不完全反对婉约词的创作。

第五章 结语

苏轼的密州词作数量不多，但这一时期在苏词发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苏轼在密州才开始自觉地对词进行革新，开辟了“豪放”词派，他的《沁园春》便是证据。如，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评：“苏轼密州时期的词作，标志着豪放词风的初步成熟，为词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⁷⁹

苏轼的提出“以诗为词”与“自是一家”的词学理论，成为其革新词体的核心理念。“以诗为词”是指借用诗中成熟的精神境界、表现手法、艺术意境来丰富词的表现力，使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让词脱离了“小道”。尽管如此，苏轼仍保留了词的婉约之美和声律之和。而“别是一家”，是指让词“无柳七郎风味”，强调词应脱离柳永等人着重描写男女情爱的陈套风格，不为艳词所囿，开拓更为广阔的表达空间。虽然苏轼“别是一家”，但并不反对婉约词的创作。

文也将苏轼密州词，分成了四大类：忧国爱民、思乡怀人、唱和酬答、人生感慨，来进行分析。透过结合苏轼的生平背景，来分析苏轼密州词的内容与结构，能发现其作品充分体现了苏轼的“以诗为词”、“自是一家”、“野性”与“超然”思想。苏轼对词的革新也为后来词史提供了重大的帮助。最后，本文认为造成苏轼革新词风的原因有三点。一、生活环境的改变，从繁华的杭州，去到了质朴的密州。二、苏轼的思想品格，重要的有其“野性”和“超然”思想。三、让词

⁷⁹ 王水照，《苏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36。

无柳七郎风味, 让词脱离 “小道”。

(15165 个字)

引用书目

专书

1. 邓子勉,《新译苏轼词选》,台北:三民,2008。
2. 方智范、邓乔彬、周圣伟、高建中,《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4.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5. 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唐玲玲,《东坡乐府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
7. 木斋,《唐宋词流变》,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
8. 吴熊和,《唐宋史通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9. 徐安琪,《唐五代北宋词学思想史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0.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1. 王水照,《苏轼》,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 王水照,《苏轼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
13.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4.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
15. 郑孟彤,《唐宋诗词赏析》,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16.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专书（古籍）

1. [宋] 胡仔纂集,《苕溪渔隐丛话前后集》,台北:长安出版社,1978。
2. [宋] 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宋] 刘熙载,《艺概》,台北:汉京文化出版社,1985。
4. [宋] 彭乘,《墨客挥犀》,北京:中华书局,2002。
5. [宋] 苏轼著 [清]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宋] 苏轼著 [明] 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7. [金]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8. [宋] 赵令畤撰,《侯鲭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
9. [宋] 朱彖,《萍洲可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 [金]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专章

1. 朱德才著、李增波编,〈东坡词走向成熟的标志——略谈密州三曲〉,《苏轼在密州》,济南:齐鲁书社,1995。
2. 朱靖华,〈旷世英才在密州〉,《苏轼论》,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
3. 朱靖华,〈论苏轼“以诗为词”促成词体革命〉,《苏轼论》,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

4. 朱靖华,〈评苏轼“以诗为词”的时代意义〉,《苏轼论》,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

期刊论文

1. 陈冬梅,〈苏轼“自是一家”的密州词创作简论〉,《潍坊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页 49-53。
2. 邓昭祺,〈苏轼对柳永词之态度新论〉,《中州学刊》,2007 年第 4 期,页 192-196
3. 莫砺峰,〈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中国文化研究》2002 年第 2 期,页 1-16。
4. 木斋,〈苏轼“以诗为词”涵义综论〉,《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6 期,页 80-84。
5. 诸葛忆兵,〈“以诗为词”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页 71-79。

学位论文

1. 蒋珍珍,《论苏轼词的野性》,长沙: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硕士论文,2017。
2. 王雪峰,《苏轼密州作品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论文,2009。